

第一章 技术市场发展的经济环境

国内技术市场是国内大市场中的一个“子市场”，它的发育和发展受到其它子市场，例如消费品市场、工业品市场、金融市场的牵动和制约。因此，了解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趋势，对于技术市场的健康运作，以及进行正确的技术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过剩”时代来临

自 1996 年以来 物价增幅持续回落 国内以降价为主的竞争战愈演愈烈，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过剩的时代，这是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显著特征。

国家发展计划委经济研究所提出的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工业发展相对过剩时代。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生产能力过剩

据国家统计局对 900 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普查，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 60%，40% 的生产能力没有利用。汽车、彩电、洗衣机、自行车和钢材等的闲置生产能力分别为 55.8%、53.9%、56.6%、45.5% 和 38%。除少数工业品的需求不足是由于高进口关税和国内价格垄断等因政策保护过度而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外，大部分工业品生产能力的过剩是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和结构调整长期严重滞后造成的。1998 年初，全国消费品和工业品积压占库达 3 万亿元，经济过剩已成为工业发

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二、一些公共产品生产能力出现暂时的、局部的相对过剩

“八五”国家投资重点向基础设施倾斜，大大缓解了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从 1996 年开始，发电、交通运输、通讯能力都出现了相对过剩。

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使我国原来在封闭形势下过剩不明显的产品迅速出现了过剩

以往国内市场封闭长期掩盖了这一实际过剩生产能力，一旦国际上竞争力强的产品（价格、质量、服务的优势）进入国内市场，许多产销不对路和质次价高的产品自然就卖不出去。

国家发展计划委经研所在确认经济“相对过剩”后，提出克服经济过剩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目前社会上对实业投资比较迷惘。表现之一是，感到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利润高的行业越来越少。许多工业品生产过剩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剧烈的竞争使以往许多高利润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人们感到钱越来越难赚，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当其市场环境由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变时都会遇到的。

表现之二是，实业投资正在出现某种萎缩的迹象。一部分企业没有把贷款用于实业投资，而是挪作它用。1997 年 1—5 月累计，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仅比上年同期减少 1 亿元，但企业存款却比 1996 年同期减少 880.8 亿元。

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严重。农业连续两年的大丰收和 1997 年的夏粮大丰收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出现了“卖粮难”，甚至还出现了副食品和蔬菜的局部过剩，出现了“卖蛋难”、“卖菜难”和“卖果难”。政府已下决心以保护价收购，但实际工作中由于资金到位问题和仓储问题，“卖粮难”依然存在。这也是一种经济过剩问题，只不过粮食过剩是暂时的，我国的粮食问题还远未解决。另外，近些年来，农

民的购买力一直不高，企业开拓农村市场不力，这是当前经济启动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需不断加强。股市火爆的背后暴露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风险意识淡漠、缺乏风险约束机制。过度投机、操纵股市扰乱了股市的正常发育，加大了股民的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自律意识，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利，需引起高度重视。

金融风险与结构调整过程有直接关系，当结构调整严重滞后时，企业会更加困难，银企关系就会十分紧张。结构调整和经济过剩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在不同区域会有不同反映，区域内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特别是那些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的煤炭、纺织等行业，生产能力早已过剩，没有及时淘汰或转化这部分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条件下，大面积的亏损和破产在所难免。

在经济过剩时代，市场空间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某些行业和产品处于过度竞争状态，非价格竞争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在国内市场上，啤酒、饮料、洗涤剂、化妆品、染料、彩色胶卷、大屏幕彩电、录像机、音响、小轿车、照相机、空调机及压缩机、复印机、计算机、自行车、机床、程控交换机等行业或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国外产品已经取得或者正在取得优势地位。“经济过剩”时代的到来，标志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重视质量”的阶段，各产业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将更加重视。

迎接微利时代

自从 1996 年 5 月和 8 月中国人民银行两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后，1997 年 10 月和 1998 年 3 月，中央银行宣布再次下调利率。据悉，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银行存贷款利率平均下降了 6 个多百分点。毫无疑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

国居民的存款利润大幅度降低了，而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由此而来的，将是人们要对获利观念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而调整的核心是——迎接微利时代。

在一个经济匮乏时代，紧缺往往可以带来高利润，高利润必然驱动高投资，而高投资经常伴随高通胀，高通胀必然带来高利率，于是就出现了“四高”现象。从 80 年代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基本呈现这么一种状况。但到 1995 年之后，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求大于供的局面缓和了，相反，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供大于求。

以家电行业为例，据轻工总会信息中心预测，1997 年全年可生产电冰箱 1050 万台，比上年增长 13% 可生产房间空调器 800 万台 比上年的 646 万台增长 23% 可生产洗衣机 1200 万台 比上年增长 12%。这些产品的出口也在稳定增加，增幅在 20—50% 之间。例如 1—6 月份，电冰箱出口 81.5 万台，比上年同期增长 98% 空调器出口 66.85 万台，比上年同期增长 41%。

然而在企业效益方面，家电行业的利润率却在下降。据轻工总会 1997 年上半年 247 家企业统计，利税总额 6.78 亿元，同比下降 22%，利润 3.14 亿元，同比下降 54.7%。与此同时，亏损却大幅增长，同比增加 89%，达到 3.1 亿元。247 家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只剩下 400 万元的利润。

这一现象值得认真思考。为什么在产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效益却在不断下降？事情很明显：激烈的竞争带来价格下降，由此导致利润减少，利润率的逐年降低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家电，其他几个行业也出现了高增长、低收益现象。这些行业主要有商业、摩托车、汽车、外贸、纺织、电子器件等。其共同特征是行业内部竞争十分激烈，虽然社会对这类产品的整体需求呈不断上升的势头，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压价倾销和争夺市场份额的结果是行业收益下滑。

还有一些行业处在低增长、低收益的状态。如石油化工，据对 13 家石化上市公司的统计，主营收入增长率为 13%，主营利润增长率却下降了 36%，平均主营利润率为 7.34%，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24%。

综合起来看，目前主营利润率最低的为商业，其次为钢铁、外贸、汽车、机械、化工、石油化工、农林渔、化纤、摩托车和家电，其数字分别为 4.17%、4.23%、5.62%、6.2%、6.97%、7.12%、7.34%、8.78%、9.17%、9.21% 和 9.22%。

通过这些微观的统计，可以看出这几年里企业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并且实际上已降到银行贷款利率以下。大部分国有企业流动资产负债率在 90% 以上，即主要靠银行贷款维持周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维持银行的相对高利率，企业必然吃不消。因此，降息是势在必行的。

利润率下降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竞争，有了竞争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垄断性利润才会降低，因此，对竞争的鼓励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

生产能力的增加造成供给增加和竞争增加，由此带来价格下降和消费物价下降，通胀率下降最后带来银行利率下降，而利率下降又将进一步降低生产资金成本和产品价格，产品价格的下降将再次影响通胀率。其结果，利润率、通胀率、银行利率一环扣一环，最后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我国经济在今后能以一种比较健康而平稳的方式发展，那么可以肯定我国的“三率”会向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看齐。

利率下降促使人们调整投资方向，第三次降息的消息刚一传来，反应敏捷者立刻在证券市场上应声而动。1997 年 10 月 22 日，深市成指从 4550 点开盘，一度摸高 4750 点，成交量一下子放大到近 150 亿元。在这一天，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局面。497 和 696 国债分别在一天之内上涨了 5 元多，896 国债上涨

了 2.5 元。涨幅之惊人，历史罕见。

银行贷款利率下调和证券市场火爆，意味着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难度减小。另一方面微利时代的到来也对企业的经营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应当以什么措施迎接和适应微利时代呢？大幅度地增加产品数量 and 市场份额，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内市场毕竟在迅速发展，大多数消费品和工业品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加，我国的外贸出口也在迅速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以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例如，我国年产鞋 40 亿双，世界上有很多人穿中国鞋。我国成为世界钟表主要生产国之一。世界钟表贸易量为 10 亿只，而经中国组装的钟表达 6 亿只至 7 亿只，也就是说世界钟表贸易量的 60% 为中国出口的钟表。

总之，微利时代到来之后，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主要不是体现在商品需求的数量增长上，因为在微利时代，单纯的数量增长与收益下降同时发生。市场空间是一个“多维空间”，数量需求只是市场空间的一个“子空间”。除此而外，还有质量空间、性能空间、品种和型号空间、价格空间和服务空间等等。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在上述子空间中还有大量的发展机会。例如，同样的产品，只要质量达到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其售价就可能成倍提高，收益也能显著提高。

企业在微利时代争夺市场空间的手段和途径是多元化的。单纯降价倾销其实是下策，这种恶性竞争使很多企业亏损破产，侥幸取胜的企业，在廉价市场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企业向市场的其它“子空间”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因此，微利时代某种意义上就是企业创新的黄金时代，也是技术转移的黄金时代。

经济改革向“硬核”突进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是显著的、多方面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并使得恢复古老的中华文明有了希望。

然而，改革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改革是从局部和边际开始的，真正的硬核我们还未触及，如同国外一位学者所言：中国改革“好走的路都走完了”。下一步改革会遇到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和地方分利集团的消极或抵制态度，而且来自民众的支持程度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态度。

事实确实如此，在收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也足令世人瞩目。首先，国有企业总体效益持续下滑，而且有向更严重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次，伴随改革进程，出现了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改革的社会心理结构，使改革的社会环境陡然变得严峻起来。此外，失业人数的增加、地区之间利益矛盾的加剧和普遍的社会心理失衡，使社会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也明显增加。上述几方面的情况表明，我国的改革到了应该有所突破而且必须有所突破的时候了，当然，实质性地推进改革，需要我们作出坚定而又明确的选择。

硬核之一：实现政府归位

我国自 1978年开始的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民间经济力量响应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致的制度变迁，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是这场颇具世界意义的改革的主导因素。政府之于改革的重要性表明，政府必须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改革才能保持其对于改革的推动和领导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改革的深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体制与改革的需要保持同步和协调。实现政府制度改革的要旨在于合理规范政府的利益和作

用，实现政府归位。

首先，我国今天的发展无疑得益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种发展的结果却又要求更深的改革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和发展着市场制度本身，并要求将市场经济的逻辑贯彻到底。因此，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就成为规范政府权力和利益的第一个界限。那些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机构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不同利益，因其缺乏历史合理性而终难为继。

实现政府归位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政企分开，放权让利的改革只是行政性分利行为，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真正意义在于政府必须将自己在企业的政治利益分解出来，同时，简化政府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一方面，实行政资分开，政府放弃所有者职能，并将这种职能一分为二，一是交由一个专门的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二是将众多小型企业，包括一些中型企业转变为非国有的公有企业。第二方面，实行政企分开。就是指政府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把企业纳入行政管理范围，这应当是政资分开的自然结果。

实现政府归位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别开。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公有制不等于国家所有制，而是包括城市集体企业、集体乡镇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劳动者为主的股份制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是非私有的，就是公有的，国家所有制只是公有制一种独特的形式。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代表的城市改革十几年的艰难历程告诉我们，深化改革的难点在政府，深化改革的希望也在政府。

硬核之二：培育改革的利益主体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都是利用了利益的杠杆作用，利益主体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者，它之所以能够充当改革的利益主体，是因为通过改革不仅实现了效率，而且通过改革还将实现更大的预期利益。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简单总结有以下几条：

第一，利益主体明确。“耕者有其田”作为决策点，使广大农民成为改革政策的积极而坚定的拥护者，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二，政府成为次生利益主体。农村改革虽然具有诱致性质，但其有效实施借助于自上而下的政权力量，如果没有政府成为次生利益主体，农村的改革要顺利进行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改革成本较小。首先，农民在旧体制下无既得利益可言，退出旧制度损失很小；其次，包产到户制度，双方自愿，政府与农民的协约成本很低；再次，以户为生产单位，组织费用和核算费用大为下降；最后，简单易学，学习费用不高。

第四，操作简单，有法可依。土地具有可分割的自然属性，易于实现分田到户。农村各项改革政策、法规供给比较明确、适当和及时，使农民对改革产生稳定的预期。

第五，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了农村社区的内涵，为实现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然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放权让利的改革，虽然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面向市场的意识较计划经济时代有所增强，但是，放权让利的实质是行政性分权，这使得企业仍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与政府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国有部门职工来说，城市改革是以“破三铁”开始的，它迥异于农村分田到户那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故大多数职工对于改革是抽象认同，具体抵触，普遍的心理状态是：除非改革能带来更大的净收益，否则，积极性不高。实际上，城市改革以来，大部分职工和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期望，从预期利益、比较利益到实际利益都未能得到满足，因此，他们事实上是改革成

本的承担者而不是受益方，很显然，他们之作为城市改革利益主体的角色规定是不充分的。

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迟缓，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利益主体角色不明朗，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是“主人翁”的政治和道德义务。只有通过“劳者有其股”的动力机制，才能使其在新的改革条件下获得新生。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城市改革的利益主体的培育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硬核之三：建立现代公有制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与此同时，改革也日益显示出总体非均衡的性质，并突出地表现为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这使得国民经济中条件最优越的部分成了效率相对低下的部分。从 1978 年到 1994 年，国有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8%，而非国有经济增长率高达 25%。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 80% 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拉动。对 200 个企业进行“改革对企业技术创新依存度的影响”的调查显示，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均把技术变革列在第一位，而国有企业则把改善管理列在第一位。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在管理问题解决之前，技术创新的贡献将是有限的，过低的管理水平会使技术创新的大部分效益被吞噬。比较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在管理上的差异，根源在于产权问题。以产权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完成之前，国有企业不具备稳定的技术进步动力机制。因此，找到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搞活国有经济，就成了当前改革十分迫切而又关键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打算给出现代公有制的一般涵义。所谓现代公有制，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探索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它是传统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或曰现代形式。其特点有三方面：一

是市场非零；二是主体多元；三是公有非纯。所谓市场非零，就是指现代公有制与市场存在的兼容，并以市场机制作为其实现的基本机制，在此基础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主体多元，指产权公有所容纳的各种公有制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制、传统集体所有制、劳动者为主的股份制、外资控股的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乡镇集体所有制等多种形式。公有非纯，是相对传统公有制总是以单一公有形态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抽象公有而言的，现代公有制应当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和社会占有相融合的公有制，它是一种具体的公有制。

现代公有制理论的提出，为国有制改造指明了方向。有了现代公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向其他形式的公有制之间的转移，就变成是公有制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因而在理论观念上的障碍不再存在。同时，由于现代公有制的特征之一是“公有非纯”，国有企业职工将获得相应的资产所有者身份，同时，还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这样，职工就成为劳动力与资产的双重权利主体。他们可以以资产所有者身份从属一家企业，也可以以劳动者身份进入另一家企业，由此，国有企业职工必将成为现代公有制的利益主体，而经典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之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者身份才能真正得到体现。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获得了普遍、平等、真实的所有权，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政府机构改革的趋势

在经济改革向“硬核”突进时，政府机构的改革非常关键，也非常敏感。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从体制上和机制上清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经过长期酝酿，政府机构改革的趋势和举措已明朗化，并从1998年全国人大之后开始实施。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

一、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

凡属竞争性行业，专业部门改组为行业协会；凡属自然垄断性行业，改组为总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行政垄断性行业，要鼓励开展竞争，成立若干家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

二、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

大大缩减分配指标、分配资金的做法和权限，规范少数必须保留的审批权限，这是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的一项实质性内容。

三、加强执法监管部门

执法监管部门要加强，但要避免一事多头、部门重复、扯皮和相互掣肘，能统一的统一，能归并的归并，真正作到精简、统一、高效。

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1998年要重点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计量质量检验认证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仲裁机构等，并脱离其对行政机构的依附。

政府机构改革的前奏是认真清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人们认为，清理和调整的原则首先是解除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将属于微观经济的职能还给企业，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

其次是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审批的范围，把要素分配和资源配置的职能转移给市场，政府只行使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审批，将行政分配方式改为实行公开招标和拍卖。

三是把企业财产审计、资产评估、计量质量检验认证、公证、仲裁业务和培训、科研设计等其他服务性业务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联结政府和企业的桥梁作用。

四是政府要加强规划、协调、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即使要保留少量审批职能，也要实行公开化、规范化。

中国官多，或曰“干部多”。有多少呢？据有关资料，1979年

党政机关干部为 279 万，1989 年为 543 万，十年翻一番，超过人口和财政增长速度。官民比例由建国初期 1 : 600 发展至 1991 年的 1 : 34。

我们的资料统计严重滞后，因此还没有 1997 年的官民比例数字，估计不会再是 1 比 34 了。我们拥有庞大的“干部大军”。

从延安时期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到解放后六度进行机构改革，“兵”是越来越少，“官”却是越来越多了。早些年就听说一些机关的某些部门，“官”比“兵”多，以为是笑谈。如今说来，恐怕不是笑话，而是严重的事实。

有人说，改革多年，触及到机构改革的内容很少，机构改革已经成为改革中的最大堡垒之一。这是一场触及领导机关灵魂的不流血的革命，比企业、农业改革更深刻、更艰难。也有人预测，1998 年是“裁干年”，或者说是“干部下岗年”。不论从什么角度看，官员要“消肿”已经成为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也有了可能。这些年，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不统一，群龙治水、分散管理，已严重制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1998 年要抓住政府换届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尽快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养老、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险。在统一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同时，按照政事分开原则，建立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独立经营、统一精干的法定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政府机构的改革应切实防止走过场。

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大调整

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处境困难，基本原因是它们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双重的历史性变革之中。

从已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当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之后，随着市场工业品供大于求局面的出现和产业技术的

进步，竞争加剧，优胜劣汰力度增强，传统工业和老工业区处境特别困难，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和破产，失业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这时，产业结构不得不重新调整，生产集中、资产增加。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

例如日本在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就处于这个阶段。当时日本的煤炭行业和纺织行业都曾有过全行业亏损的纪录。日本矿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者人数的比重由 1955 年的 1.4%，下降到 1965 年的 0.7%，再降至 1975 年的 0.2%。日本全社会的失业人数从 1953 年的 46 万人，增加到 1959 年的 95 万人，再增加到 1978 年的 124 万人。日本纺织行业总产值在 50 年代曾占其社会生产总值的 40%，而目前只占 4%。

美国 50 年代也处于这一状况。美国采矿工业 50 年代初还有就业人员 100 万，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2.2%；到了 50 年代末从业人员就只剩下 70 万了，比重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 1.3%。美国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在 1943 年分别拥有近 220 万人和 130 多万人，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12.6% 和 7.6%；到 1959 年两行业的就业人员分别减少了 106 万和 36 万，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下降为 7.0% 和 6.0%。归结起来美国在 50 年代初的完全失业人数还不到 200 万，而到了 50 年代末却达到了 468 万人，失业人数增加了 1.3 倍多。

再如西德，在 1950~1975 年间，工业部门净产值构成中，采矿工业由 8.15% 降为 3.64%，纺织工业由 10.22% 降为 3%，而电气电子工业由 4.49% 上升为 10.06%，机器制造业由 7.47% 上升为 10.77%。采矿工业工人由 57 万人减少到 24 万人，鲁尔区失业率高达 7.5%，纺织工业由 51 万人减少到 34 万人，失业工人很多；而电气电子工业由 26 万人增加到 97 万人，机器制造业由 46 万人增加到 100 万人。又如法国，由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1960 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总消费量的 54.5%，1970 年下降到 25.8%，

使得法国煤炭行业就业人数由 1962 年的 20 多万人减少为 1970 年的 12 万人。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采矿和冶金、造船、纺织等行业中。而且这些行业在 1974~1975 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失业特别严重。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阶段性的特点正在我国表现出来。一些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区正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1995 年与 1991 年相比，煤炭采选业职工人数由 555 万减少为 521 万，减员 34 万人；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职工人数分别由 27 万、73 万减少为 22 万、62 万，共减员 16 万；其他采选业职工人数由 60 万减少为 2 万，减员 58 万；纺织业职工人数由 756 万减少为 673 万，减员 83 万。普通机械制造业职工人数由 963 万减少为 405 万，减员 458 万。具体的行业分析表明，亏损三年以上的国有企业中，仅煤炭、纺织、森林、军工四个行业的亏损额，就占了全部亏损额的近 80%。目前比较困难的老工业基地主要是采掘基地和纺织基地，由于这些老工业基地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很高，使得行业性困难看上去又带有很大的体制特征。实际上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使部分国有企业正处在工业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调整期中。

在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间的兼并、破产、重组频繁，生产和资本积聚进程加快。与此同时，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中，生产集中过程也在迅速进行。在短短几年中，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行业排名前 10 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或接近 90%。

因此，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历史现象，是阶段性的，也是暂时性的。对此，需要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正确认识。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于改变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在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重组，积极推进“两个转变”，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

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对于困难企业的破产、转产、兼并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要从宏观上引导企业加快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加快生产集中和产业重组过程，尽量缩短转变过程的时间。

当前，有些行业的调整已经出现了可喜效果。上海纺织业正在力争在全国同行业率先突围，建设“都市纺织”新高地。

上海纺织业 1997 年可实现利润 3 亿元，是 1996 年的 20 倍，亏损金额减少 1.1 亿元，国有资产增值率达到 4.8%。经过一年的总量调控，全面压缩初级棉纺加工业的同时，增强了以资产为纽带的外控能力，外控资产 19.45 亿元。

上海纺织业以建设“都市纺织”为目标，拟定三项标志性工程。一是精干主体、压缩总量。在保持适度棉纺生产能力基础上，从 1996 年开始到 1999 年压锭 75.82 万锭，2000 年之前国有企业保留纺锭 68.9 万锭 形成规模在 3 万锭以上的棉纺基地 12 户。到 1999 年，再就业中心基地基本关住“进口”，不再搞大规模下岗。二是重构支柱产业，形成建设高地。支柱产业将从原来的化纤、服装、纺机调整为大服装、大装饰和产业用纺织品，并通过两年努力，使三者比例从目前的 76 : 12 : 12 达到 60 : 20 : 20。三是加快企业改制和科技产业化步伐。将加快推进股份化改造、经营群体持股经营、经营风险抵押承包、租赁经营等方式，实行经营者“输不起”的贴身经营，拨出 1000 万元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基金，全面建立分层实施的产学研一条龙开发机制。

笔者认为，一部分企业在 3~5 年内走出困境，大部分产业在 10 年之内完成结构调整，是完全可能的。

民营企业面临二次创业

截止到 1996 年 我国私营经济注册资金已达 5917.8 亿元 其中注册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有 62617 个，500 万元以上的有 6298

个，私营经济已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民营企业的数量统计中包括了私营企业，所以总量上又比上述数字大得多，因此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若干年前，一些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进而又在实践中探索了二次创业的模式和规律。

大部分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阶段，基本上是“一业一技一品”起家，即少数人依靠为数不多的资金，在某一个行业中，开发或引进一项技术成果，长期生产一种主打产品；主要目标也比较明确而简单，即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些民营企业由于机制灵活，捕捉市场机会准确，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涌现出瓜子大王、纽扣大王、袜子大王、钻头大王、饲料大王等等。也有的企业成为某一种产品和技术的代名词，如四通与打字机，联想与汉卡，北大方正与计算机排版。这些企业在一次创业时业绩是辉煌的，通常都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份额。

“二次创业”是“一次创业”的延续，是一部分卓越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站在改革的潮头，对民营企业未来发展提出的极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是与“一次创业”有质的区别。然而一经提出就被众多的民营企业认同、接受，进而成为群体发展战略。有人总结为“五化”，即产业规模化、组织集团化、资产股份化、管理现代化和运营国际化。因此二次创业是高起点、高难度、高层次的运作。

民营企业的优势是运作机制灵活，没有国有企业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婆婆妈妈的限制。但是管理则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弱项，也是二次创业必须突破的难点。大多数民营企业停留在“家长”式和“家族”式管理的初级阶段。有的则是“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兄弟跑供销”。创办人个性的差异、个人的偏好对企业运作影响很大。当企业规模扩大，摊子越铺越大时，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使主要当权者疲于奔命，力不从心，活得“很累”，甚至未老先